

佔領之後 – 香港需要嶄新的青年政策

闕品方

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十三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筆者剛從美加回來。闊別香港才兩三周，一看彷彿變了個樣子。香港不再祥和守法；年青人的理想訴求，要走到霸占街頭，肯定這中間出了紕漏。現在佔中，學聯和學民三個團體臨崖勒馬，擱置在佔領的區域舉行廣場公投，似有轉機。日後政府如能成立多方平臺或獨立委員會協調政改，僵局或可打破。事實上，眼下學生和青年在打頭陣，幕後有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在角力，各激進派別試圖借助青年學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把原本書生氣十足的[愛與和平佔中]的號召扭曲成為破壞法紀的鬧劇。現在法治的基礎被侵蝕，守法的精神被動搖，如果這場運動最終不能和平收場，將會是一場大災難，香港極可能從此由盛轉衰，沉淪一段頗長的日子，其破壞力遠遠不止於經濟上的損失。

套用鄧小平 1989 年六四事件後的總結，香港這場雨傘運動，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港的小氣候互為影響之下形成的，就像俗語所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早晚要來，避免不了。這場運動是 21 世紀全球一體化，市場環

球化和信息普及化三大因素互動造成的，是新一代年青人對旧意识,舊體制和舊秩序的徹底反叛和抗爭。資本主義和市場主義是極度個人自利主義的體制，加上環球金融財經制度向金融資本傾斜的內在缺失，智力和勞力的回報率遠低於土地,科技及有形和無形資產的回報率，加上通货膨胀带来资产价格不断上扬,致令年青一代缺乏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人浮於事，難於置業，但社會上物質的誘惑就在眼前，感到被富裕階層剝削，形成仇富心理，因此他們要奪回新一代的話語權。這是大氣候。中港關係，受到東西方不同價值觀的碰撞和衝擊，155年英國殖民統治和17年回歸中國的強烈對比有極大落差，加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成長，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差距拉近，香港對中國經濟貢獻的重要性今非昔比。因此，中國崛起的勢頭越厲害，香港年青一代感到委屈，就越發感到疏離。內地人來港購物，置業，生小孩，就業，讀書，旅遊，掙錢，來勢洶洶，規模令人咋舌，搶去本地人原來就不多的各種機會，而年青人就首當其衝,特別深有痛感。加上香港政制架構的某些缺失和當年基本法制定時對政制發展考慮不周，分區直接選舉被少數政客鑽了空子，反對派當得容易;以罵政府和罵建制來掙得選票,可做永遠的反對派，而無需認真地負責任地钻研政策準備要上臺執政。這些政治生态，17年來逐漸變得路人皆知，不少評論都已有深入分析,在这里不再多說。

從這個角度看，這場雨傘運動，就是不可避免。與其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才爆發開來，不若順水推舟，讓它充分暴露之後，徹底解決。從這個角度看，坏事可以變成好事。至於所謂外國勢力，網上流傳不少消息，不分真假，但國際活動在香港古已有之，或許於今為烈，沒有什麼奇怪。就如同黑社會勢力，全世界到處都有。對個別政治人物進行攻擊，要某人下臺，號召人們上街支持，甚至集體辭職變相公投，提出要與特區政府以至中央

政府直接對話。這一切，在運動中有人混水摸魚，在明眼人看來，一目了然。政客在其中抽水，招兵買馬，躲在學生和青年身後指揮策劃，個別報章熱烈鼓動以謀增加銷路，各類手法層出不窮，都不難理解，不算新鮮。

問題的關鍵是，這場運動應如何結束？結束後應從中取得什麼教訓，要採取什麼新的措施對應？這才是我們長遠來看要真正關注的問題。能夠對這些問題有初步的答案，才能夠轉過頭來，解決當前的緊迫問題。二者是互動的，並不矛盾，更難有先後之分。

現在看來，亂局既成，客觀的人們都會承認，在香港，民主真的很難一蹴即至，政制改革當然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來。2017年普選特首，將會是一大進步。不論8月31日的人大常委決議有什麼不足之處，現在看來定出這框架好像只是一少步，多年後回過頭來看，我們會發覺這實在是一大步。對香港的民主選舉和對中國的民主憲政，都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如果青年學生們能平心靜氣，所謂見好即收，參與建立一個多方平臺(或獨立委員會)，為2017年的特首普選有關提委會民主化，提委會入閘低門檻化，和提委會出柵名單制這三方面努力爭取，盡量擴大民主成分，而且堅持這個多方平臺(或獨立委員會)要廣納年青人和學生組織的代表，公開，透明，公平，公正，和平，有序，協商，互動地有商有量，做好政改餘下的三步曲，那就給與全港市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個良好的印象，把危機轉化為無比的正能量和向良好方向轉變的契機，展示香港新一代年青人和學生的氣魄和胸襟，則何事不可為？！政客不行。我們為邁向[真普選]鋪墊，應寄希望於在這場雨傘運動中堅持不懈的80後和90後！

香港的成功得來不易。我們不要讓它壞在這一代人的手裏。我們絕對不能破壞法治。民主就是互相尊重和彼此包容。這纔是我們熟識的民主社會。

怎樣漂亮地退場，如何有序地自首，這場運動如何推演下去，為建設民主香港，怎樣示範給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如何在國際間樹立文明形象，這些問題，是佔領運動的青年和學生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在這裡重申，政客不行，寄希望於在這場運動中堅持不懈的 80 後和 90 後！讓我們牢記雙贏的立場，大愛的原則，和平的方法，協商的態度。這樣纔是真正懂得民主真諦的年輕一代新人。

但是，這樣還不夠。沒有一個嶄新的青年政策，直面大氣候和小氣候形成的根本原因，香港的基層，青年和學生都不會接受。新的青年政策要能夠實際地分析和解決具體問題。什麼是困擾基層，青年和學生的根本問題？這些根本問題，政府怎樣才能夠較好地解決？有什麼針對性的具體措施幫助他們？

筆者人在旅途揪心時，不斷深思以上這些問題，還沒有想得很清楚。這裡簡單列出一些政策範疇，包括如下各個方面，例如成立青年事務局，幫助青年創業，大力扶持社會企業，鼓勵並贊助青年北上加深對中國的客觀了解（筆者說過，香港的出路在中國；我們要維護好這個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設獎學金和助學金到歐美以及世界各地留學或遊學，首次置業可緩付地價，成立民主教室由青年人自主管理，鼓勵青年人參政，檢討通識教育，大力扶持創意產業和互聯網產業，復興文藝教育，加強體能訓練，鼓勵青年人加入紀律部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前特首董建華先生一把年紀，退休多年，現在重出江湖，要成立智囊團，為香港的未來出謀獻策，感激之餘，希望提醒一句，不能再以舊思維，用舊方法，試圖解決新時代下新一代人的問題。我們要多聽，多學。聽他們怎麼說，請他們共同參與。學習新的通訊工具和方式和新一代溝通。

最后,让我们看看梁啟超是怎样談民主的。中国民主何以区别于西方民主呢?西方民主主义之出发点在人权:为要保障人权,所以行法治;为要发展人权,所以行代议制。中国民主主义,其出发点在人性:为要尽性,所以提高人格,培养人治;先筑基础于自治,期收效果于德治、礼治,而法治有以辅之。我们要取长补短,融合东西方的长处。

胡适之说过,一个常态国家,政治的责任在成年人,年轻人的兴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 在非常态的时候,政治不能充分代表民意时,那麼干涉政治的责任就落在青年學生身上。笔者学生时期当年也曾做过学联的副会长,因而特别对青年和学生的看法和热情深有认同。

一輩子都在研究民主的美國學者 Robert Dahl 在 85 高齡的時候,寫了《論民主》這本小書,為了要給大家一個清楚的定義,讓人們討論民主的時候,有個依據。他指出五種民主基本元素,分別是有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資格。有效的參與,是指可以參與和知情,投票的平等則保證票票等值,充分的知情可以確保資訊的流通透明,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則意味人民可以自己決定什麼可以討論、什麼不要討論,而成年人的公民資格則是主權在民的具體展現。這五點元素,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對民主最清楚、可操作而且容易理解的操作型定義。那末,要落實大規模的民主,需要利用什麼樣的制度配合?他提出了六點制度要求:選舉產生的官員、自由、公正、經常的選舉,表達意見的自由,多種的訊息來源、社團的自律自主,以及包容性的公民身份。這六種制度可以確保民主在大規模實施時仍然得以持續,這也是目前

世界上主要民主國家都有的或多或少的制度設計。這樣的制度，被稱做「代議制度」,仅供参考,但不成其为国际标准。

香港和中國的民主化的道路，長路漫漫，我們堅持著一起走。所谓即食式的国际标准,原来就是没有的。

(完)